

论《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

于树军

【摘要】铁凝在《大浴女》中在对“文化大革命”历史与人性的褶皱进行了深刻冷峻的重审与拷问的同时,还试图为那些伤痕累累的亲历者探寻一条走出历史阴影,摆脱“罪与罚”的折磨,进而完成“自我救赎”、获得新生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大浴女》所具有的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内在张力以及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使其对以往的“伤痕”文学有所深化和超越,这种独特的“后伤痕”叙事的深层意蕴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挖掘。

【关键词】《大浴女》;“文化大革命”社会病象;自审;“自我救赎”;“后伤痕”叙事

【作者简介】于树军,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5)。

【原文出处】《北方论丛》(哈尔滨),2019.4.56~63

铁凝的长篇《大浴女》于1999年年底创作完成,并于2000年4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经时任“布老虎”丛书主编的安波舜及著名批评家白烨的精心策划,《大浴女》在2000年春季全国文艺图书集团订货会上以20万册码洋的佳绩位居榜首^[1],成为当时的一部畅销书。

煽情的广告语、以女人胴体为封面的设计,以及扉页的简介^①,让《大浴女》这篇“半命题作文”^②的商业化气息与通俗小说面孔显露无遗。然而,扉页的简介(出版社的宣传推销)与小说思想内蕴之间却存在明显的裂隙。事实上,小说文本所突显出来的反思批判意识与人文关怀并未为商业化的通俗小说气息抑或畅销书的表象所遮蔽,通俗性与严肃性的并置恰是《大浴女》的思想内蕴的复杂性与叙事张力之所在。质言之,铁凝在都市生活题材、情感故事与理想主义的通俗小说表象之下,在冷静节制而跳跃的叙述中,并未回避对“文化大革命”历史以及亲历者进行冷峻的审视和灵魂的拷问。

与过去的伤痕小说以及1990年代盛行的各种关于反右、“文化大革命”回忆录等热销书籍的最大差异在于,铁凝在重审历史和个人的同时,还为那些遭受冲击的亲历者与沉重的历史,为曾经结下恩怨情

仇的人与人之间搭起了一座“和解”的桥梁,试图让这些背负着沉重精神苦难与“十字架”的当事人走出阴影,重获新生。此乃《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的核心要义所在。

本文以《大浴女》中的特定时代的革命书写作为切入点,参照1960-1970年代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及铁凝的童年经历、文学观、价值取向等诸要素,对《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及其文学史意义展开探讨和阐释。

一、“性的苦闷”·“生的苦闷”:荒诞异化的社会病象批判

1968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会。不久,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党政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各种‘五七干校’和山区、农村、基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2](p.253)]。小说主人公尹小跳的父母尹亦寻、章妩夫妇即是在这次运动中被下放劳改。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对他们的身心、婚姻、家庭、亲情造成了剧烈的冲击。他们的子女亦被抛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人生命运被彻底改写。

时为北京建筑设计院工程师的尹亦寻,曾“因言获罪”,和妻子章妩一起被调出北京调到外省建设

计院,这次调动显然带有惩罚的意味。后来,他们被下放到苇河农场进行劳改。尹亦寻、章妩每天从事着拉车运砖和装车的繁重劳动,但他们并不反对革命。劳动之余,他们也参加学习、批判、斗争、检讨,“用这些方式努力撕扯着覆盖在他们身上的非无产阶级的烙印,滚一身泥巴踩两脚牛粪,他们也热情地想过要脱胎换骨”。

然而,“这种劳动已被暗示是没有期限的”,劳改之初,“首要的一件事便是夫妻必须分居”,男女宿舍都是长长的一排大通铺。他们也有“懦弱”和“想入非非”——“身体和心总有不清净的时候”。“当他们一身臭汗灰鼻子灰脸地结束一天的劳动,回到各自的男女宿舍时,丈夫是渴望得到妻子的,如同妻子也渴望着丈夫。”劳动改造并未使他们“净化灵魂”“脱胎换骨”,反而愈发加重了难以言传的性苦闷。

农场的山上有一间小屋,只有星期天才会向集体宿舍的夫妻开放。众多夫妻都要在小屋前排队,等待进去做爱,知识分子的清高与自尊,在那一刻已经无关紧要。为了能进入那间小屋,从清晨开始,一对对男女由远及近、错落分布在小屋的周围,或在树下或在菜地里,抑或坐在砖头上仿佛在彼此谈心。当一对夫妻完事后走出来时,离门最近的一对便随即进入屋内。“先来后到,夫妻们心中很是有数”。期待已久的那一刻终于到来,章妩和尹亦寻“立刻心照不宣地往小屋走”。此时,另一对夫妻也匆匆朝着小屋逼近,离小屋还有二十来米的时候,两对夫妻展开了一场沉默、激烈的较量。

他们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又窥视着对方,算计着该如何先一步到达;他们的急迫也使他们顾不得自己的走相儿……他们就差拔腿奔跑了……章妩扭动着腰胯大步向前,一心想要抢先占领小屋……她有点儿为自己的大步害羞,因为这大步就是她的欲望……她有欲望要和她丈夫做爱。她大步走着,说不清这是自己的无耻还是自己的无奈。当他们终于幸运地抢先到达这小屋推门而入的时候,她忽然觉得特别对不住被关在门外的那对夫妻。

接受劳改的夫妻们排队等待,尤其是争相跨进山上的小屋做爱的场面可谓惊心动魄,令人五味杂陈。这些夫妻在禁欲与原欲的双重煎熬下,不再顾忌身份尊严,能先别人一步进入小屋,满足被深深压抑的性欲成为他们最为迫切的问题。然而,还有更加让人揪心的一幕:

竞赛使她(章妩)和尹亦寻气喘吁吁而又神思不定,他们没有爱抚也没有更多的言语,尽量迅速行事……甚至没有互相凝视……他们懂得自我约束,没有谁能关着门没完没了地磨蹭。即便如此,在一个星期日子里,也不是每对夫妻都能如愿,那没轮到的,便静等下个星期日的来临。

无疑,“星期天”和“山上的小屋”对于劳改夫妻具有特殊的意义,夫妻之间的性爱竟如偷情一般,这令人心酸的一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黑色幽默”的意味异常浓重。

然而,当章妩与丈夫从小屋出来后,“她立刻会想起苇河镇上的烧鸡,很可惜她不能两样同时兼得”,她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眩晕症。事实上,像章妩这样对遥遥无期的劳改满心惶恐的现象在当时是真实的且普遍存在的。同样经历过劳改的季羨林和当时很多人一样,也曾一度陷入绝望:“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出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山区劳改终生了。”^{[3](p.95)}

吊诡的是,几乎没有一个亲历者会认为劳改能够让其灵魂得到提升;相反,在价值真空与失序状态的荒诞的时代里,长期繁重的劳改与人性尊严被肆意践踏,往往会让人逐渐沉沦堕落,走向异化。季羨林对此感触极深,“折磨论”即是他从劳改经历中思考和总结出来的:“这种打着劳动的旗号折磨人的办法,只是改造人的身体,而绝不会改造人的灵魂。”“折磨的结果只能使人堕落,而不能使人升高。”^{[3](p.116)}确实,在遭受长期非人折磨与不公待遇的压迫之下,人的身份尊严、性格意志甚至善恶羞耻之心,极易被销蚀殆尽而坠入迷失自我、堕落与自暴自弃的深渊。

作为普通人,知识分子也有人性的基本欲求。章妩因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与“食”“色”本能欲望的压抑而患上了“不清不白的眩晕症”。而她能够逃避劳改的唯一手段只能靠出卖肉体从医生那里换取病假条。这一切正是因“文化大革命”(及劳改)对人的世俗欲望的极端禁锢使然。对知识分子没有期限的劳动、开会、学习、斗争、批判、检讨……这种身心上的双重“改造”其实就是一种“折磨”,置人于本能欲望的极端压抑之下,被逼就范。在此意义上,“山上的小屋”成为一个极富讽刺与批判意味的象征符号,劳改夫妻每逢星期天被允许到“山上的小屋”“团聚”,乍看上去是一种颇有人情味的人道之举,而实则是对知识分子人格尊严的一种变相侮辱。

那一时期,人性尊严与基本权利受到肆意践踏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严重,在很多像章妩这样的案例之外,更加让人心惊胆战、不寒而栗的是,在“革命”剧烈冲击之下,无数鲜活生命的陨落。

在荒谬的年代,人的生存与死亡也显得异常荒诞。小学教师唐津受家庭身份的影响,未能获得组织批准与相爱之人结婚,却生下了私生女唐菲。“文化大革命”之初,这对母女遭到了人格尊严的极大侮辱。唐津为了保全女儿及其生父的名誉以及避免女儿被一同示众批斗的噩运,在被逼喝下粪尿汤后,不堪受辱而上吊自杀。

唐菲在母亲自杀后,跟随舅舅唐医生生活,却并未得到亲情的关怀。她很快便误入早恋、逃学、打架斗殴的歧途,与不良社会青年鬼混……学业、前途由此尽毁。为了换取留城工作的生存权,她只能一次次地出卖肉体……本该生活在父母身边幸福快乐成长的唐菲,却在动荡的岁月里,经受了如此之多、如此残酷的磨难。最终,正值花季的她突患疾病,带着寻父无果的遗憾而离开人世。

唐菲的舅舅唐医生在断绝与章妩的男女关系之后,因与女护士偷情被捉,情急之下,赤身裸体的他爬上烟囱上纵身跳下,坠地身亡。此外,电影导演方兢在重新回归社会后的疯狂病态索取的扭曲人格心

理,正源于他劳改期间所遭受的难言的屈辱(大龄妻子对他的性虐待,致使他的身心深受摧残)。

《大浴女》所展现的苦难岁月中的“性苦闷”“偷情”“性交易”“性变态”乃至“非正常死亡”等事件绝非个案。种种社会病象无不折射出了人性尊严在极“左”年代所受到的无视与践踏的非理性与荒谬性。

“生的苦闷”是“文化大革命”社会病象的另一重要表征。“抓革命、促生产”是1960-1970年代的纲领性指导方针,然而,“革命”并未真正促进生产,生产反而因“革命”而受到剧烈冲击,导致国计民生陷入严峻的困境。

小说毫不避讳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困境的揭示,曾与唐医生有染的女护士,因在外地工作的丈夫迟迟无法调回而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以及性的苦闷。“在那个‘生活问题’几乎是政治问题之外最严重的问题的年代,她为了自己的生活也为了自己的快乐”,而与医院里的电工、食堂的大师傅私下来往。“她从来也不小看大师傅因此在每次打饭时盛给她的超量的饭菜——人生在世,谁不是为了挣饭吃呢。她饭盒中那一人份的饭菜,足够她和她的两个孩子吃饱”。女护士与人私通,表面上看是出于自愿、“各取所需”,但实为艰难的困境所迫!章妩、唐菲、女护士的“生存之道”,令人鄙夷也令人同情。

刚读初中的孟由由因背诵毛语录时将“革命”误说成是“请客吃饭”,从此失去了课堂发言的机会。十三岁的她在备受打击与失落的同时,开始对“革命”与“吃饭”问题萌生质疑:“虽然我背错了语录,但是你仔细想想,就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革命是为了什么呢?”“‘革命’……革命至少是为了请得起客吃得起饭。”“暴动的人不吃飯能有劲儿暴动吗?”“我就怕饿,我最怕饿,我饿的时候谁要给我口吃的,让我管他叫爷爷都行。”

毫无疑问,正是饥饿——生存本能逼使普通人开始对“抓革命、促生产”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孟由由的这番无奈而坦诚的表达,可谓对当时温饱问题的严峻性做出了真实而深刻的注脚。同时,这又

何尝不是受过“文化大革命”冲击、感同身受的作者借孟由由之口,对荒谬、非理性的“文化大革命”的质疑与批判?!

其实,发生在章妩、唐菲、女护士、孟由由身上的事件仅仅是当时社会病象的一个缩影。章妩想吃苇河镇烧鸡而不得所患的“眩晕症”、唐菲用身体换取留城工作的名额,女护士的“生活问题”、孟由由对吃的极度渴望的背后,所牵涉到的乃是当时国家经济政策的失误、粮食统购统销等因素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停滞与下滑、城镇人口温饱难题与就业压力增大等一系列异常棘手的社会民生的严重困局。

“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运动对国计民生造成了重大损失,“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效益大幅下降”,“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人均年消费粮食1976年低于1952年水平”。“全国职工平均工资下降”,“造成了严重欠账,配给票证比‘文革’前又有增加。”^{[4](pp.739-744)}“1957-1978年,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处于徘徊、停滞状态,(社会)福利水平很低”^[5]。

粮食的极度短缺是1960-1970年代的普遍状况,而贫穷饥饿是成长于那一时期的一代人的共同记忆。赵园的《饥饿》《吃》《钱》、陈思和的《苦难时期》、莫言的《觅食》、韩少功的《饥谨》等回忆性随笔中对此都有所描述^{[6](pp.53,75,83,87,91)}。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1960年代饿死人的事件经常发生,农村城市都一样。她曾在北京郊区看到饿死的人全身浮肿,甚至有人迫于饥饿竟要吃粪池里的蛆虫^{[7](p.11)}。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困境已危若累卵,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革命”与“生产”(包括吃饭)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抓革命”与“促生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在当时亦让周恩来忧心忡忡:“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8](p.43)}“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9](p.935)}“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没有办法。”^{[10](p.5)}

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对国际形势、战争危险的估计过于严重”,突出强调“备战”和“片面积累”,与“帝修反”“争时间、抢速度”,以“促进国民经济‘新飞跃’”和重工业建设——不切实际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急于求成的经济政策,因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脱离了当时实际”^[11]。因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普通百姓的粮食供应/“吃饭”问题一再被压缩减标。1972年召开的商业部粮食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举措,以解决粮食统购统销的差额问题。如削减城镇“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停止招工,遣返涌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核减农村粮食销量,压缩粮食补助……^{[12](p.386)}而公安部门也被要求参会研究联合把关问题,共同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13](p.239)},以缓解票证年代的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的紧张局面。

小说展现的种种社会病象,其实皆是普通百姓在为1950-1970年代的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而付出的沉重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在揭示极“左”年代的国民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同时,铁凝还通过孟由由、尹小跳等人物表达了物质世俗欲求的合理性。“在那个否定俗世情趣的年代,尹小跳与她母亲都在寻求着俗世的幸福,母女俩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14](pp.188-189)}。在物质极度匮乏的革命岁月,尹小跳与同学唐菲、孟由由对吃和穿充满了无限渴望,受《苏联妇女》杂志的启发,她们偷偷地在家一次地尝试用简单的食材搞烹调聚餐,披上橡胶雨衣搞时装表演。当她们在蜂窝煤炉上做成了甜点烤“小雪球”时,激动得快要哭出来,她们倍加珍惜地品尝着这些美食,感受到了“生活是可以这样美”。

诚然,“在那个政治惟上的特殊年代,人的所有俗世需求都变成了大逆不道”,但“即使在政治高压下,也扼制不了人的正常欲望的释放。”确如有论者所言:“《大浴女》充分描写出现实生活的物欲化特征,也表现出物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小说并未“以否定俗世的方式来达到超越俗世”,而

是“通过对俗世欲望的肯定来批判‘文革’反人性的本质”^[14](pp.188-189)。

事实上,小说正在一个貌似通俗爱情题材小说的框架内,巧妙地嵌入了一个带有“伤痕”意味的副文本,小说的叙事张力与深刻的思想内蕴中得以突显。

二、忏悔·和解·救赎:《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

对人性的褶皱进行冷峻的审视与无情的揭露,是构成《大浴女》深刻的思想内蕴与张力叙事的一个关键要素。从某种意义上,《大浴女》亦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即“忏悔”和“救赎”的小说。

铁凝一方面对尹亦寻、章妩等劳改分子及其子女的悲惨遭遇予以深切同情,但同时也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章妩、尹小跳、唐菲等人的自私、贪图安逸、嫉妒、仇恨及自暴自弃等人性的弱点,真实、立体地呈现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人性的复杂性。对曾备受政治运动冲击的两代人自身的原欲与人性之恶进行了冷峻的逼视与拷问。

从某种意义上,章妩、唐菲、尹小跳们的“罪与罚”恰恰源于她们的“原欲”,即受生存与生理欲望的驱使而犯下了不可挽回的过错,她们因此注定要承受道德良知的谴责以及自我灵魂的拷问与审判。长期请病假在家的章妩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为了换取一张病假假条以逃避劳改,她竟主动与唐医生发生并且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甚至还欺瞒丈夫生下了私生女尹小荃,进而为尹小跳、唐菲“合谋”“杀死”尹小荃的“罪与罚”埋下了种子。在劳改结束后的日常生活中,伴随她后半生的是来自丈夫、女儿的惩罚性的刁难与折磨,以及夫妻间永无休止的争吵。章妩内心的伤疤时常被丈夫戳痛,无法愈合。对此,铁凝并未刻意回避、掩盖章妩的道德污点,而是将其自私空虚、好逸恶劳、浑不知事的性格弱点暴露无遗。

年幼的尹小跳对母亲章妩与唐医生的不耻关系以及妹妹尹小荃的真实身份一清二楚。她心里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以至于嫉妒、仇视这个备受母亲宠爱

的同母异父的妹妹。而缺失母爱,从未得到舅舅唐医生的关爱、反被视为“绊脚石”的唐菲,同样对这个表妹尹小荃心怀恶感。在强烈的嫉妒仇视心理驱使下,尹小跳和唐菲竟无意间“合谋”将尹小荃置于死地。唐菲事先偷偷将井盖移开,而当尹小跳眼见妹妹坠井却并未及时施救,最终致其死亡。从此,她们便陷入深深的不安与自责之中,无法言传、深重的负罪感一直苦苦纠缠着她们,挥之不去。

正值花季的唐菲带着寻找生父而不得的深深遗憾,以及千疮百孔的累累“伤痕”而患病离世,如此不幸的结局或许正是她的“罪与罚”的一种隐喻。尽管唐菲离世之前终于坦白自己才是蓄意搬开下水井盖,致使尹小荃坠井而死的主谋,让尹小跳卸下了负罪的沉重枷锁,但是出于嫉妒、报复心理的尹小跳在尹小荃坠井后却袖手旁观,这种见死不救的做法,暴露出了尹小跳人性中的阴暗残忍的一面。而她在后来的工作生活以及恋爱中的带有自我“受虐”“惩罚”意味的做法——譬如,明知电影导演方兢不会跟他结婚却依然将初吻和贞操献给他,甚至愿意以此作为对曾遭遇不公待遇的方兢的一种补偿;后来与陈在的刻骨铭心的恋爱,乃至就在两个人即将结婚之际却最终选择退出,将自己深爱的陈在还给了善良本真的万美晨……这一切似乎皆可将其理解为尹小跳对自己曾犯下的罪过的某种“惩罚”/代偿与“救赎”之举。

在小说末尾处,尹小跳同已经退休的副省长俞大声之间有关“生命”与“死亡”、“罪与罚”、“忏悔”与“救赎”等终极问题的对话,寓意非常深刻。俞大声从一本犹太人的书中感悟到了生命价值的可贵与不可侵犯的神圣。他选取书中的一段文字念道:“一个罪人,他纵火烧毁了一座庙宇,那最神圣的,那世上最受尊崇的巨厦,被处以仅仅三十鞭子的惩罚;倘若一个狂人杀了他,那狂人所受的惩罚将会是死刑。因为所有庙宇和所有圣地都抵不上单一个人的生命,哪怕是纵火者、渎神者、上帝之敌和上帝的耻辱。”俞大声对犹太人所秉持的“生命的不可侵犯的

神性”——即对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应予以尊重和敬畏的理念甚为认同,更关键的是,这也为尹小跳终于敢直面和反省自己曾犯下的严重“过失”提供了重要契机。

尹小跳……说您读的这段说到了生命价值。

他(俞大声)说对,生命的价值,一个民族对生命的尊重。

她说比方您,您想到过自杀吗?

他说没有,最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想过。

她说那您有过要消灭一个生命的冲动吗?

他说没有,为什么你要这样提问呢?

她说因为我有过,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罪人摧毁了我心中的庙宇圣殿,这一切罪过也许只够挨三十鞭子的,但是我却成了狂人,我就是那个狂人。

这段对话乍看上去在整个上下文语境中貌似显得不甚协调,甚至有明显的突兀感或者说叙事的断裂,但实际上,它在整部小说中所占分量颇重,它恰恰是《大浴女》“后伤痕”叙事的根本依据所在。谴责纵火的“罪人”、杀掉“罪人”的“狂人”以及对生命及其价值等终极问题被一并提出,其深刻寓意早已超出了故事本身。尹小跳首次直面自己曾犯下的“间接杀人”的严重过失,承认自己就是那个曾犯下“杀人”罪过的“狂人”,并对自己进行了灵魂的拷问。可以说,此时的尹小跳才真正对生命的真谛与生命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她深深领悟到了:生命的宝贵以及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敬畏是最重要的。

历经人生种种、经过灵魂涤荡、领悟到生命的真谛的尹小跳,在看到俞大声的小孙女之后,不仅联想到了两岁就坠井夭折的妹妹尹小荃。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出现,让一直背负沉重的道德枷锁的她获得了一种超脱与释然。

那五岁的小女孩儿跑过来了,尹小跳恍惚看见了幼年的尹小荃。那就是两岁的尹小荃吧,仙草一样的生命。这是她心房的花园里第一株嫩芽,她作践这嫩芽,这嫩芽却成全了一座花园。

她……闻见了心中那座花园里沁人的香气。福

安应该是香的,她想,就让我重新开始吧。

……

她微笑着注视那孩子,内心充满痛苦的甜蜜。

在经历“罪与罚”与灵魂的涤荡之后,尹小跳终于得以蜕变,完成了“自我救赎”。她也因此得以重新回到了曾经一度迷失的“心房的花园”,心灵回归真善美的原初之状。

可以看出,铁凝意在让历史的亲历者在历经灵魂的涤荡与蜕变之后,与历史之间的恩怨纠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最终达成“和解”。要为那些苦苦挣扎却依旧没能抚平伤痛进而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的亲历者们探索一条抵达超脱、释然与重获新生的路径,作者的良苦用心从中可见一斑。

诚然,对宗教与人性的皈依,成为尹小跳式的“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们卸下“罪与罚”的灵魂枷锁,抵达宽恕、和解与自我救赎的彼岸以及走向新生的“涉渡之舟”。

三、童年经验·文学观·人文情怀:“后伤痕”叙事的深层动因

有论者指出,《大浴女》“树立起一面镜子,为历史、为人性,映照出被社会的和心理的原因所蒙蔽的某些本相”^[15]。铁凝对“文化大革命”历史以及亲历者的重审,为我们认知和把握特殊社会语境中的个人与历史、政治,人性欲望和道德良知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形象而深刻的参照。

其实,自创作伊始,铁凝便自觉地以冷静持重的写作态度谛视个人与时代、政治、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最早在其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1980年)中,流露出了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灶火的故事》的写作是我对人性和人的生存价值初次所做的坦白而又真挚的探究……它对于我80年代之后的写作,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在这个短篇小说里,我初次有了“犯规”的意向,向主人公那一辈子生活在“原则”里的生活提出质疑。^[16]

在之后的小说《棉花垛》《玫瑰门》《大浴女》中,铁凝依旧沿着这种“犯规”的反思路径,对人性

与历史、政治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审视与思考。而这种持续的思考正是缘于铁凝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与感受。

童年的特殊经历直接影响了铁凝日后打量世界与人生的眼光,而“文化大革命”经历与记忆则成为她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我就读的寄宿小学停课了。我回到家里,而等待我的又是和父母的分别,他们将带着我两岁的妹妹去‘五·七干校’劳动,我则必得单独返回北京……寄居在外婆家”。当时年仅十岁的铁凝在与父母、妹妹离别之时,“对前途心中无数,脸上强作自然;我妹妹更是满脸难忍的惶恐”^[17](p.33)]。

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父母的劳改、亲人的离别对年幼的铁凝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心理创痛,也使其童年充满了阴郁黯淡色彩。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我来到这世界时,中国一批正直的成人正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

当我作为一个少年被卷进动荡的十年,童年的一切便十分遥远起来……由于父母境遇的改变,我开始忏悔。我在日记里忏悔自己每日每时的过错,那既是真心实意的忏悔,也是不知不觉的自我表现;我努力认真地用领袖的格言要求自己……我常常生出一种诉说的渴望,诉说自己对人类那大公无私的敬仰,诉说自己那“私”字一闪念的闪念。^[22](pp.461-462)]

从铁凝的这段回忆自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她内心所受到的剧烈冲击,尤其是如此年幼便因世事无常的变故所导致的心灵世界出现异化倾向,譬如“真心实意的忏悔”与自我剖析心中“‘私’字一闪念”,让人顿感心酸和悲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受极“左”思维观念的侵蚀,年幼的铁凝曾一度为父母的知识分子身份感到自卑,甚至产生了“忏悔”意识。

由于父母被下放改造,铁凝“八九岁就被迫寄居在亲戚家,等于是没有父母,当时生活条件非常糟糕,没有红色背景的家庭生活也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些东西是不愉快的”^[19]。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运

动,不仅直接导致铁凝长期缺失父爱母爱,自卑、无助感,也一度笼罩着她的内心世界。正是铁凝在被送到远在北京的外婆家之后的所见所闻,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可谓影响深远。“我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启蒙便是少年时在外婆四合院里的那段生活。那院子本是一部微缩的人生景观,该看与不该看的趁我不备都摊在了我的眼前”^[18](pp.461-462)]。

动荡的岁月里,童年的铁凝过早体验到了普通人在革命年代中的生存的艰难与精神困苦。尤其是,生活境遇的骤变“一下子就使一个少年没有防备地看到听到许多她本不该看到听到的人间变故,必须过早地看一些不明白的人和事”^[14](p.102)]。

多年以后,铁凝回忆外婆家的胡同风波时,仍心有余悸。外婆家所住的胡同因为政治运动而不再平静安详,门上的对联被换成了红纸黑字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后来,胡同更加激荡起来……不久,又有规定让各家院门必须敞开,说若不敞开院门中必有阴谋,晚上只在规定时间内方可关上。外婆的黑漆大门……终日在众目睽睽之下”。小院子中,住着一对中年知识分子夫妇——崔先生和崔太太。一天,性格孤傲、早年曾留学日本、时任某自动化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崔先生被人抓走,从此十年间杳无音讯,崔太太就在当天夜里疯了,不久便死去。“这一切我总觉得和院门的敞开有关。”十几年后,当崔先生回到家中不久也疯了^[20](pp.3-6)]。

诚如作者所言,胡同里发生的如此惊心动魄的一幕,本不应被如此年幼的铁凝看到。然而,除了惶恐以外,尽管当时尚不清楚事件背后的真相,但从“这一切我总觉得和院门的敞开有关”一句,能够感受到童年时代的铁凝在当时就已萌生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某种质疑。极“左”政治运动对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冲击程度之深之广,尤其是对他们无辜的子女的心灵所造成的重创,是无法想象的。

除了父母被下放劳改,铁凝的大伯父也直接受

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她在很多年以后仍不禁感慨:“‘文化大革命’之于他是不公平的。十年运动过后,他已是一位本不该老的老人,六十岁的人已宛若九旬老翁。有谁能说清楚其中真正的原因呢?”^{[21](p.66)}毫无疑问,父母与亲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遇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灵创伤,无论是对铁凝的历史观抑或文学观所产生的影响都是相当深远的。

铁凝说:“生活的变迁影响了我以后看生活看人生的眼光。”^{[14](p.102)}正是她童年时代在外婆家的四合院与胡同里的见闻,直接影响了其日后的文学价值取向,更是促使她在《大浴女》的通俗情感故事的主文本之外,嵌入“后伤痕”叙事的深层原因。正如洪子诚所言,“反右”运动至“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在理论上也许可以作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但实际的情形,特别是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21](p.3)}。的确,在《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中,铁凝以“灵魂在场”式的写作,向读者展示的正是“文化大革命”历史给她这一代人“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而精神、心理层面的创伤的确是难以说清和无法量化的,因此也是最难以抚平和治愈的。

铁凝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要写出你内心深处最打动你的、最令你不安的故事。”^[19]“小说最重要的品质”,乃是“直逼人心的那种思想的力量”^{[22](p.201)}。事实上,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品格对铁凝的影响非常之深,《大浴女》就潜含着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某种特质。“托尔斯泰让我感觉到伟大,不是他的大善,他最终通过忏悔达到的解脱,恰恰是他没有出路感……陀斯妥耶夫斯基从宗教入手,他表达的是人类灵魂永远的钝痛。”^[23]而铁凝在刻画、剖析“文化大革命”受难者,尤其是背负着沉重的灵魂枷锁而苦苦挣扎的尹小跳、唐菲们的内心世界时,让人感受最为深刻的正是小说所呈现出来的

那种“直逼人心”的“不安”与“钝痛”。此乃铁凝深度揭示历史的褶皱与人性弱点,甚至阴暗残酷的人性之恶的文学价值取向的重要因素。

1999年,铁凝在挪中文学研讨会上作的题为《无法逃避的好运》的发言中阐明了她对文学价值取向的深刻理解:

文学可能并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它却始终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它的魅力在于我们必须有能力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必须有勇气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24](p.267)}

在“世纪末”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凡有社会责任感与人文情怀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们势必会通过某种方式去回望、反思、总结个人和国家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一切。而《大浴女》即是铁凝以文学的视角来回望、反思中国的当代史,尤其是屡次遭受政治运动冲击的亲历者们的艰难坎坷、辛酸苦涩的人生历程与心史的独特方式。

作为《玫瑰门》的延续和深化的《大浴女》,正体现了文学“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不断重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问”,“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的内在本质与价值,而这也正是严肃文学所具有的核心特质。

不过,铁凝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审视与拷问的底色之外,还通过文学给人以温暖和力量,即力图寻求一种超越政治、历史时代的人文关怀,在反思历史、政治与拷问人性、灵魂的同时,又为人们打开了一扇窗,为那些深深陷于精神炼狱中的“受难者”指明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因为,在铁凝看来,“文学(终究)还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些温暖、要有体贴人生的成分在里面”^[25]。

小说往往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看法”的表达。铁凝认为,只有“勇于反省”并“不断清理”和“提升自己的灵魂”,才能“继续往前走”^[26]。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亲历者们与历史达成“和解”,才是他们于

“文化大革命”苦难中获得解脱与“自我救赎”的现实出路。当然,这也正是铁凝的《大浴女》与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最为根本的差异,或者说《大浴女》的“后伤痕”叙事的核心特质所在。

四、结语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步入了新的历史转型期,“团结一致向前看”、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与现代化建设成为全党工作重心。而随着“两个凡是”的终结以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最终定性,意识形态导向也做出了重大调整,控诉“文化大革命”、揭批“四人帮”的“拨乱反正”思潮随即被淹没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浪潮之中,正值日趋走向深化的伤痕文学也因此被叫停。

显然,根据当时国家的顶层设计与权衡,“伤痕”文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大力宣传改革开放成为新的时代诉求,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阻碍因素,无疑更为紧迫。然而,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全党工作重心的调整与迫切发展经济的现实诉求,客观上造成了伤痕文学一直未能摆脱“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某些文学成规的束缚,而直接导致其在新时期文学的审美观念与创作范式这一框架内,处于只有文学史意义而文学价值不足的尴尬境地。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伤痕文学的“历史起源”。“‘文革’为中国文学提供了讲述故事的动力、素材甚至灵感”不仅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贯穿于整个八十年代,甚至延伸至九十年代”^[27]。实际上,九十年代虽已“告别”了“革命”,但人们对历史的反思、重审却并未停止。1990年代中后期,曾一度被终止而沉寂多年的“伤痕”叙事同各种“反右”“文化大革命”回忆录一道,再度浮出历史地表。“从1994年《顾准文集》的出版开始,世纪末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一批与知识分子的历史相关的‘解禁书籍’,并在1998年形成图书热点和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28](p.46)]。此间,《思痛录》(韦君宜)、《牛棚杂忆》(季羡林)、《狱里狱外》(贾植芳)、《文革中的我》(于光远)、

《“大跃进”亲历记》(李锐)等反思“反右”与“文化大革命”的丛书及回忆录集中亮相,并一度热销。历史无可避讳、往事也并不如烟,那场浩劫所造成无数人的命运沉浮与心灵创伤,依旧在亲历者心中隐隐作痛。

在既有的历史结构框架以及社会语境中,相比那些书写“反右”“文化大革命”苦难的回忆录,铁凝的《大浴女》在“伤痕”书写与“文化大革命”历史批判的维度之外,抑或说在撕开政治、历史、人性深处的阴暗、丑陋、残忍的褶皱的同时,又以一种超脱政治之上的人本主义情怀,抚慰、疗治那些遭受“罪与罚”的灵魂,力图使个人与历史在近乎无解的纠缠与困境中达成“和解”。试图为那些难以释怀的苦难的亲历者(及其后代),指出一条“宽恕”、“超脱”、“和解”的路径,进而最终完成一代人的“自我救赎”与“集体救赎”。(至于依凭宗教的力量来达成自我与集体救赎的有效性可另作探讨)《大浴女》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想象性”的文本实践,为那些“当事人”的精神出路与心灵的安顿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从某种意义上,《大浴女》可被视为铁凝“对以往创作的一次总的盘点”,“对20世纪”的“一个交待”^[14](p.180)],同时也是对伤痕文学的承续、深化和超越。可以说,《大浴女》超越了伤痕文学对“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简单批判与否定,将单一的政治与思想维度的批判和反省延伸到了更为广阔的包括家庭、婚姻、爱情等社会日常生活空间,尤其是将特殊历史年代的一批“受难者”“当事人”曾一度被过滤掉的人性褶皱如实地揭示出来,展现了更为真实复杂的人性与众生相,在处理政治、历史、人性这一复杂问题的力度更加有所深化。

《大浴女》中对以往的伤痕文学有关个人与历史的错综纠缠的处理方式的突破,以及重审历史与人性弱点的精神向度,尤其是在冷峻的审视中所潜含的人性温情与人文关怀,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文学史意义。

铁凝的《大浴女》再次将这一无法安置和处理的现实难题提出来并予以尝试性(想象性)地解决,此举既显示出铁凝作为作家的责任感,也不免流露了西绪弗斯神话般的某种身陷两难境地的无助感与宿命论的意味。这一价值取向,恰恰是“世纪末”的一种特殊的文学与文化“症候”。而以《大浴女》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的“后伤痕”书写以及安置历史的特殊方式,无疑给人们留下了进一步思考与探讨的空间。

注释:

①初版本《大浴女》扉页:一个美丽善良的母亲为了两个女儿,为了家,不期有了外遇;爱的理由、氛围、地点无不让人心动。然而,来自各方的心理黑暗,却像潮水一样弥漫了这爱的鲜活和结晶……多少年过去了,所有人发现这生命并未死去,负罪感随岁月发酵,改变着每个参与者的个性、爱情和命运。本书作者扎实的叙述技巧使小说具有澄清透明的人性魅力,并为爱、为善、为人类所应具备的高尚情怀,准备了无数催人泪下的细节。参见铁凝.《大浴女》[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

②力图要把自己打造成“中国爱情小说的生产基地”的春风文艺出版社向约稿作家提出三点要求:都市生活题材、好读耐读的故事、理想主义的基调。参见安波舜.创造品牌的三个要素[J].出版广角,2000(4)。

参考文献:

- [1]新书报[N].2000-04-28.
- [2]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1949-1976年的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季羨林.牛棚杂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
- [4]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 [5]赵德馨.中国经济50年发展的路径、阶段与基本经验[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1).
- [6]吴亮,高云主编.日常中国:60年代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
- [7]韦君宜.思痛录[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
- [8]余秋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C]//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组织.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9]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1]唐正芒.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粮食问题[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1).

[12]柳随年,吴群敢主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

[13]杨少桥,赵发生.周恩来与我国的粮食工作[M].中央文献研究室.不尽的思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4]贺绍俊.铁凝评传[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15]张志忠.现代人心目中的罪与罚:《大浴女》与《为了告别的聚会》之比较兼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题(下)[J].长城,2004(3).

[16]铁凝.铁凝文集·自序[N].文论报,1995-03-01.

[17]铁凝.铁凝影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8]铁凝.我的小传[C]//女人的白夜.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19]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EB/OL].http://news.sina.com.cn/c/2006-02-09/10469055686.shtml.

[20]铁凝.想象胡同[C]//护心之心:铁凝散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1]洪子诚.简短的前言[C]//1956:百花时代.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22]铁凝.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长篇小说[C]//护心之心:铁凝散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23]铁凝,王尧.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J].当代作家评论,2003(6).

[24]铁凝.铁凝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25]铁凝,王童.铁凝让文学带来一些温暖[J].小说界,2001(4).

[26]赵艳,铁凝.对人类的体贴和爱:铁凝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1).

[27]刘复生.伤痕文学:被压抑的可能性[J].文艺争鸣,2016(3).

[28]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与“反右”相关书籍的文化分析[C]//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